

日治初期臺灣書畫展覽會初探

——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中心的觀察

An Exploration to th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Exhibitions in Taiwan during the Early Japanese Colonial Period
—an Observation based on *Taiwan Daily New Newspaper*

侯米玲／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東方藝術史組博士生

Hou, Mi-Ling／Doctoral Student of the Department of Fine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摘要

日治之初，日人樂衷於來臺舉辦書畫展覽會，雖名為展覽會，實際是以販售為目的。其中尤以在臺灣成立、由日籍書畫家所組成的「臺灣書畫會」的展覽最為固定而頻繁。他們除了定期舉辦書畫會成員的書畫成果展覽會（稱為例行會），並在例行會上展出會員收藏的古代書畫家作品，成為「古今書畫展」。日人的書畫展覽會多具有聯誼性質，是個社交場域。又因書畫展覽常成為日、臺官紳娛樂節目，且後來在公共場域開放給一般民眾參觀及購買書畫作品，故也成為大眾休閒娛樂的場所。

每次書畫展多會透過報紙先預告作品數量（點數），有時包含作品的訂價。通常販賣收益頗為可觀，故常作為慈善募款的重要手段。

本文擬從當時臺灣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作為觀察在臺灣所主催的傳統書畫展覽的重要依據，以探討這些書畫展覽會所具有的社會功能，並剖析書畫展覽會上的商業活動，作為解釋當時臺灣社會積極舉辦書畫展覽及書畫骨董收藏風氣興盛的原因。

關鍵字：書畫展覽會、書畫骨董陳列會、藝術市場、慈善募款

前言

日治之初，日本的傳統水墨畫家便到臺灣來舉辦書畫展覽會，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自1896年至1945年之間，不論是日人主催¹、臺日人合催、或者臺人主催的書畫展覽會，總共至少有1,370次。²其中尤以「臺灣書畫會」的成立、並定期舉辦書畫會成員的書畫成果展覽會（稱為例行會）所舉辦的書畫展覽會最多。而「臺灣書畫會」的例行會上除了展出會員的作品，也會展示所收藏的古代書畫家作品，成為「古今書畫展」。其例行會原來只限於會員參加，後來也邀請其他日籍書畫家以及臺籍傳統書畫家一同展出；而臺籍書畫家也漸漸仿效日人、並有能力在臺灣各地主催古今書畫展。這樣幾近全民運動的書畫展覽會也開啟了臺灣日治前期書畫及骨董的收藏風氣，並出現許多由骨董商所主催的骨董書畫展。

剛開始這些傳統書畫展覽會只有少數日本人及臺籍菁英有能力或有資格提供作品「參與」展出或者進場參觀，但隨著臺灣人民生活水準跟教育水準提高後，一般民眾也開始踴躍蒞臨，除了掏錢購買門票進場參觀，也慢慢有能力購買展品、加入書畫及骨董收藏的行列。由於供需的大幅增加，書畫展覽會上既然成為有利可圖的場域，便吸引日本內地及大陸的書畫家或骨董商湧進臺灣來開展，甚至藉由書畫展作為義賣及募集善款的手段。同時，臺灣的書畫收藏家及骨董商也在臺灣本島或往來大陸收購書畫骨董，然後在臺灣本島開書畫展並販售。書畫展覽會因此成為藝文及娛樂之外的重要藝術經濟的商業場域。

目前有關日治時期的中國傳統書畫方面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例如1999年林雅娟的碩士論文《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水墨畫發展之研究》³、2009年謝世英〈由魏清德《臺灣日日新報》的〈忙中賞心錄〉談中日臺書畫交流〉⁴、2012年黃琪惠的博士論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繪畫與近代美術潮流的衝擊》、2013年楊儒賓主編的《瀛海探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內的三篇論文⁵等。關於書畫展覽及收藏家的論文則有2001年程佳惠的碩士論文《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⁶2007年

1. 當時的報紙以「主催」稱之，也就是漢文的「主辦」之意。
2. 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探英：台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25。
3. 參見後面的參考書目。
4. 謝世英，〈由魏清德《臺灣日日新報》〈忙中賞心錄〉談中日臺書畫交流〉，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2009年5月，頁41-54。
5. 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蕭瓊瑤，〈高砂留痕：日治時期在臺日人書畫側覽〉、王鐵軍，〈風雲與書墨：典藏20世紀初期日人書畫中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探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
6. 程佳惠，《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6月。文中提及日治時期日本人在臺灣舉辦過的博覽會情形。

黃琪惠的〈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⁷與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出版的《魏清德舊藏書畫》⁸、2010年余美玲的〈日治時期藏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⁹及李婉甄的碩士論文《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的論述與收藏》等¹⁰。但對於1927年臺展之前的二十多年間在臺灣本地所舉辦的傳統書畫展覽會「本身」的研究，尚闕如。故本文擬從當時臺灣最大報《臺灣日日新報》的記載，¹¹試著找出那些由日人或臺人所主催的傳統書畫展覽的諸多特色及所具有的功能，並剖析書畫展覽會上的商業活動的運作模式，以了解當時臺灣社會何以積極舉辦書畫展覽及臺灣書畫骨董收藏風氣興盛的主因。

一、日治初期書畫展覽會的功能與意義

（一）作為殖民者的風雅意趣之展現以及政治宣傳

日治時期總督府在宣導及推動學藝活動不遺餘力，¹²並多以博覽會或勸業共進會的形式出現，且將書畫展覽涵蓋其中。書畫展覽跟詩社的吟詩活動有異曲同工之妙，既可展現日人官僚的風雅意趣，也可以與詩社一樣作為社交的場域。¹³

1915年之後，書畫展覽會有時也成為執政者的政治宣傳的工具。日本自1915年開始的始政紀念日上增加了書畫展覽，此時書畫展成為始政紀念日上值得被展示的「成果」，它成為政治的宣傳工具，也成為始政紀念會上的「餘興節目」之一。

1915年6月《臺灣日日新報》為日本當局の始政紀念日主辦日本及臺灣書畫展於南門督府國語學校，此展乃是向全臺灣日籍及臺籍書畫家募集作品，其中本島人出品百餘點，內地人出品數十點。¹⁴1925年6月始政三十年紀念書畫展覽會於高雄舉行，由林熊光及日人尾崎秀真、荒井賢次郎、杉坂六三郎四氏主催，20日到22日

7.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2007年12月，頁111-139。黃琪惠在文中明確指出，尾崎秀真將書畫骨董鑑賞擴大到對臺灣文化的詮釋，但對其他收藏家究竟為了甚麼致力於展出他們的收藏品？並沒有特別說明。
8.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年11月。
9. 余美玲，〈日治時期藏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頁27-52。
10. 李婉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的論述與收藏〉，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11. 當時其他小報對書畫展覽的報導相對非常鮮見。本文尚有舉出一例見報於蔣渭水先生所主辦的《臺灣時報》，但與《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的數量相較之下非常少。
12. 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2007年12月，頁24。吳文星並認為展覽會為近代重要的學藝活動之一環，且圖錄中所收錄的官僚之詩文、畫軸，「略可反映當時官僚之風雅意趣」；王鐵軍則稱這些統治者「以詩歌抒情詠志，或以書法放歌交友，或以繪畫換琴探幽」是「和魂洋才」的表現。見王鐵軍，〈風雲與書畫：典藏20世紀初期日人書畫中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8。
13. 見王鐵軍，〈風雲與書畫：典藏20世紀初期日人書畫中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8。另在《臺灣日日新報》中也會刊登日、臺詩人所組成的詩社活動以及詩作。
14. 1915年6月10日日文版及6月15日漢文版報導的「書畫展覽會」條。

在北門町大成火災保險會社樓上舉辦同好者珍藏書畫珍品展。¹⁵此次的展覽共有18-22日多則相關報導，究其原因，因是始政三十周年的紀念、由報社主催，另一重要原因乃是由當時最重要的日、臺四位收藏家所聯合策展，就是最好的宣傳。

（二）作為社交場域

1895年臺灣割讓給日本，1898年日人在台灣成立「臺灣書畫會」，並自1901年開始舉辦第一次會員書畫展覽會，自此幾乎每個月定期舉辦書畫展覽會（所謂「月例」或「月例会」——每個月的例行會），是日治初期最早的展覽會，對臺灣人有示範作用。當時作為日本殖民者的行政首府——台北，理當成為日人主催的古今書畫展覽的首要展場。

「臺灣書畫會」的例行會最早在淡水館舉行。淡水館位於台北府城西門，為清末登瀛書院原址，日人將之改建為淡水館。淡水館作為展覽場所應從1900年3月15日所舉辦的「揚文會員展」開始，此展乃由日治時代第4任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舉辦。¹⁶當時邀集前清進士、舉人及副貢、優貢、拔貢、歲貢、恩貢同科諸士參加，¹⁷24日則舉辦「會員書畫展」，但「只有日本人」的作品可以參展。「揚文會員展」可說是日人及臺人某個特殊階級人士的聯誼場所，也是日本殖民者對這些前朝臺人藉書畫展之名，行攏絡之實。

「臺灣書畫會」在淡水館的例行會最早為1901年2月22日，但有詳細報導是在28日的日文版。¹⁸這次的展覽算是日治時期、臺灣本島第一次出現日本古書畫家的作品，也自此開啟了臺灣「古書畫」展覽的扉頁。吳文星先生的文章中曾略為提及「臺灣書畫會」在台灣的會員及開展的狀況。¹⁹

約自1901年5月4日的淡水館的書畫揮毫大會上，開始有臺籍書畫家參與，當時參與者為李秉鈞（李石樵）與洪以南。²⁰這大概是臺籍書畫家參與日人書畫展現場即席揮毫的最早記錄。下一次的日、臺籍書畫家參加書畫揮毫會，則為1904年由

15. 1925年6月18日日文版「高雄書畫展覽會」條、20日日文版「書畫展覽會」條及漢文版「古書畫展覽會」條、21日漢文版「書畫展覽會續報」條的報導。
16. 是日人實施「生物學的殖民地經營」的策略之一，藉以緩和臺灣人民的反抗情緒，並「培養對日本的情感」，籠絡清代中式的舊文人。見〈揚文會〉，呂紹理，《台灣歷史辭典》。
17. 當時臺北縣受邀參加者有37人，當日出席26人，臺中縣40人受邀，15人出席，臺南縣60人受邀，20人出席，宜蘭廳12人受邀，11人出席，共出席72人。同上註。
18. 1901年2月22日及26日皆有日文版報導，但26日的「淡水館的古書畫展覽」と呈條有較為詳細的展覽報導。
19. 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25。
20. 1901年5月4日「書畫大會」日文版報導。黃冬富先生亦在〈日治時期台灣東洋畫風之發展〉文中提及。見黃冬富，〈日治時期臺灣東洋畫風之發展〉，收入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主題網站<http://taiwaneseart.ntnmf.a.gov.tw/chiindex.html> 國家文化資料庫，頁4。此年李秉鈞過世，或許如此，缺席了揮毫會。

「臺灣書畫會」所主辦，當時臺籍書畫家則是洪以南與洪雍平²¹兩人。²²隔年（1905年）「臺灣書畫會」再邀請居住在臺北的「文人墨客」（日人）、滯留臺北的東京丹青會員，以及臺籍書法家（此次為羅秀惠和洪以南）一起展出。²³從這些書畫揮毫會可看出，書畫展會場不僅成為日籍及臺籍書畫家的社交場域，也是彼此作品的「競技場」。²⁴

1903年起，「臺灣書畫會」的展覽場所不限於淡水館，偶爾也會在「丸中溫泉」展出。丸中溫泉會館位於現在的臺北市西門町紅樓附近，當時的街名為新起橫街。它於1898年左右開始興建，²⁵1902年落成，並成為日人的主要集會之所。在此處集會的團體的性質非常多樣，有政治性質的，如大工組合會、秋田會、平安紀念會、統計學校出身者懇親會；有聯誼娛樂性質的，如基仙友會、燈籠會；有文藝性質的，如一品會雅集、繪葉書交換會等。「臺灣書畫會」的古今書畫展可歸類於「文藝性質」的集會，它藉由不同的展場，一方面展出或出售自己的書畫作品（今書畫）或藏品（古書畫），一方面將之成為與其他上層社會階級的臺、日人的社交場域。一開始「臺灣書畫會」的展覽不僅只限日人參加，強烈「區隔」日人與臺人的階級，報上的報導也只有日文版，一直到1905年之前都是如此。²⁶1905年在羅秀惠及洪以南一同參加「臺灣書畫會」例行會時才出現漢文版的報導。並在隔年1906年11月18日洪以南再參加了新起橫街丸中溫泉的例行會（並參加現場揮毫）、同年12月26日洪以南、羅秀惠跟洪雍平參與在台北俱樂部的例行會，皆出現日、漢文的報導，顯示自1905年開始，臺籍書畫家參與日人的書畫展覽，才變成一個足以用來作為宣示或傳達給一般臺灣民眾的重要訊息。

北部的另一個提供書畫展覽的場地為臺北鐵道旅館（新光三越站前店現址），此旅館建於1908年（明治41年），為當時唯一的一間西式飯店，當時來臺的日皇或政經要員都住在此。此處曾於1913年展出中日古書畫作品，²⁷也許是看中入榻此飯店的權貴較有財力購買與收藏書畫作品，就像現在的臺北福華飯店常舉行書畫展覽一樣，藉由書畫展覽的機會邀請日本政要來參與，除了社交之便，也可行商業利益之實。

21. 洪雍平（？1950）名詩清，號逸史，艦艇頂新街人，為淡水縣生（秀才），善詩文、工書畫，畫以花鳥與人物稱著。畫風蒼勁雄渾中，仍帶莊雅秀逸；書法尤擅行草，與洪以南並稱「艦艇雙璧」。
22. 1904年11月25日第6528號。
23. 1905年9月1日文版、9月2日漢文版「淡水館の書畫展覽會」條。羅秀惠當時是《臺灣日報》的漢文主筆，見葉美美，《從「山本氏紀念碑」探究在臺日人的移民生涯事蹟——本義信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9月，頁33。又因為清末舉人，著名的書法家，特殊身分及傑出藝術成就被邀請一起展出。
24. 吳文星先生稱之為「互相觀摩切磋」。見上註20，頁25。
25. 據1898年10月21日《臺灣日日新報》有關丸中溫泉增建的報導，則知此之前就已修建了。
26. 1904年11月25日第6528號。
27. 1913年1月20日及21日日文版報導「古書畫展覽會」條及「古書畫展覽會出品」條。

作為社交場域的書畫展覽會，也常與其他餘興活動同時開展。1911年2月時，《臺灣日日新報》主編木下新三郎氏招待官紳200名以上，大宴于勅使街道梅屋敷。當時席間有煎茶、抹茶、謠曲、圍碁、書畫揮毫等。²⁸

相較於「北部」成為最早的書畫展場以及社交場域，「南部」提供書畫古董展出及販售場地則要等到1911年臺南公館落成之後。

臺南公館為臺南枋橋頭的吳家園林，在日治初期，臺南地方缺乏集會設宴的寬廣場所，日人每有集會設宴皆向吳繼顯（吳尚新之孫）洽借吳家，或商借位於幸町一丁目（昔日之龍王廟街）的「兩廣會館」作為開會設宴之所。鑑於吳國庭院景色優雅，地方官民遂於明治41年（1908）集資成立民間組織「社團法人臺南公館」，並選定此地為籌建現代化公共聚會場所之地點。吳氏子孫受迫於政治壓力，終變賣吳園土地一甲（三千多坪）予該社團法人闢建「臺南公館」，1923年改稱為臺南公會堂。²⁹臺南公館由日本建築師由矢田貝陸設計，建館工程於明治43年（1910年）9月正式展開，44年（1911）2月初落成啟用，成為臺灣最早創建的一座具公共集會功能之現代建築物，並於1911年2月7日舉辦第一次古書畫及古器物展售，當時還因展出數量太多，而又別室作為骨董賣店。³⁰此次的展覽與販售未獲滿足，故於17日在臺南公館樓上再展出書畫展，此次除了邀請臺南書畫家作品參展，也有臺北、臺中及內地諸家的作品參與展出。³¹這樣跨縣市的書畫聯展，也可算是一種社交手段。

另一個南部的展覽場為「打狗鐵道俱樂部」，自1913年開始由日人玉置塊北主催的古書畫展，席上並與赤城山人現場揮毫供參觀者抽籤取得。³²這樣結合揮毫吸引觀眾，實際上為了促銷收藏品的書畫展，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銷售方式，本論文第二部分將詳細介紹。

上述之古今書畫展覽會，不僅開啟了臺灣地區的一般人民觀看藝術品之眼界，也使得臺籍書畫家興起效法日本傳統書畫家，進而赴日學畫，³³並間接促成臺籍人士加入收藏古書畫的行列，對臺灣早期藝術發展的環境營造具有重要的貢獻與歷史意義。

28. 1911年2月25日漢文版報導「大宴名流」條。1911年2月27日漢文版後續報導「大宴詳報」條。
29. 出自吳園藝文中心網站的介紹。<http://w2.culturetainan.gov.tw/extra/wucukure.htm>（2014年7月瀏覽）
30. 1911年2月7日日文版報導「臺南書畫展覽（六日臺南發）」（原文無「」）號）條，1911年2月8日漢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會」條。
31. 1911年2月22日日文版報導「臺南書畫展覽會」條。
32. 1913年1月28日日文版報導「打狗の書畫展覽會」條，此次出品約百點，展出品包括畫軸、短冊、尺牘。
33. 黃冬富，〈日治時期台灣東洋畫風之發展〉，收入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美術升薈」主題網站<http://taiwaneseart.nmofa.gov.tw/chiindex.html> 國家文化資料庫，頁4。洪以南於1907年前往日本安排長子留學，應該也是受到影響所致。見〈雜俎〉，《臺灣日日新報》，1911年1月30日，「洪以南君略傳」：「當四十年間，東京開博覽會，君赴內地觀光，並攜其哲嗣長庚留學內地。」

（三）作為休閒娛樂場所

日治之初的書畫展覽會皆由日人主催，且只有臺、日上層社會階級者才能入場參觀與購買。他們並喜歡在展覽會上兼行泡茶（呈茶）、插花等餘興節目，並向參觀者保證不會「無聊」。³⁴在「臺灣書畫會」的例行會場上，尤其是在淡水館³⁵的展場，最常見這樣的餘興節目，並以1902-1903年最為盛行。³⁶除此之外，有些「共進會協贊會」反倒以書畫展覽作為「助興節目」。³⁷大概從1908年開始，「古今書畫會」便常常與日人最愛的盆栽會一起舉行，有助於增加展覽場上的「熱鬧」度。³⁸亦見對日人而言，這兩者都具有同等的休閒娛樂性質。1911年2月共進會舉辦了一個盛大的古書畫及骨董器物的展覽會，儼然成為專業的骨董書畫展主辦單位。³⁹同年臺南新公館的共進會上，也安排了許多的助興活動，計有藝妓舞蹈、煙火及古書畫展覽等，展覽會上並有本島人合奏清樂。⁴⁰

從日本始政臺灣開始，書畫展覽的主催者幾乎都是日人，一直要到1913年方出現臺籍主催者⁴¹（臺人學習日人主催要花費近10年光景）。此時除了臺人已從日人處習得主催書畫展覽的技術，了解書畫展覽的有利可圖，一方面應該也與臺人的生活水準與教育水準皆有明顯提升有關，也才能有隔年之後的慈善捐款活動的開展。

而相較於日人主催的書畫展覽大都在具有「俱樂部」性質的室內私密場所（會館、博物館、俱樂部、公會堂、⁴²臺籍有錢人的莊園、林家花園、北郭園、臺南公館等），⁴³

34.1903年3月24日日文版的報導「淡水館 古書畫 席上揮毫」條。

35.吳文星先生也提到，總督府在1898年時開放淡水館作為官紳集會、文藝娛樂活動之場所，且長達十餘年。見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報英：台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

36.1901年10月15/16日、1901年12月20/24日、1902年1月18/22日、1902年8月12日、1903年3月19日、1907年2月18日的報導標題皆為「淡水館月例會餘興」。

37.1908年11月6日漢文版報導「餘興發展」條，「八日間有古書畫展覽會，將開於八角樓上…」

38.1908年11月26日漢文版報導「紀協贊會」條：「…且時間書畫會、盆栽會、古書畫骨董會等。以使共進會熱鬧。」

39.1911年2月3日漢文版報導「共進會彙報其二」條。

40.同上註。

41.在1913年7月29日的報導，「27日在艋舺龍山寺區役場舉辦書畫展覽，主催者（主辦者）為王子鵲，展出品二十五點，其他有六、七、八點者出品亦多…張謇夫、孫貽經之中堂、諸昇雲竹、董其昌、葉化成之短幅、西村（呂世宜）對聯填刻賣出…」主催者為韓人王子鵲，而非書畫家，算是很特別的。

42.臺北收藏家蔡宜甫也曾在1925年6月的開館序言中提到，「內地人載筆來遊，到處開書畫展覽會者，洵不乏人。在博物館、在公會堂、在茶樓、在酒肆…」見1925年6月16日漢文版「臺北書畫館序」條。本內文中已列舉出許多實例。此現象在吳文星的文章中也提及。見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報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4。

43.除了前面所述的淡水館等地，1907年小林松偃在彰化俱樂部、1912年3月5日臺南辯護士川原義太郎氏在臺南御影溫泉旅館等展出收藏書畫品，「邀請官紳」「廣開春宴」，見1912年3月5日漢文版「臺南通信」第一條；1925年林熊光及日人尾崎秀真、荒井賢次郎、杉坂六三郎四氏主催在北門町大成火災保險會社樓上舉辦同好者珍藏書畫珍品展；1915年4月5日漢文版報導的「書畫展覽續報」條，當時於新竹北郭園展出書畫展：「是日三村廳長引導一行貴賓，搜尋北郭園八景古蹟…鑑賞古書畫。」基本上這些是屬於臺日上層社會所主催的展覽，皆在會館、俱樂部等「室內、私密的空間」，且觀眾都是臺、日上層社會人士。

臺人主催的地點偏好「公共場域」，例如廟宇（臺北弘法寺、⁴⁴新竹城隍廟、中港天后宮）、繁華大街（新竹街）、永樂市場（張純甫約在1929-30年於此開骨董店）等，且會選在有人潮聚集的時節，例如廟宇的建醮及日本殖民者的成果展、物產品評會、教育品展覽會、衛生展覽會等。如果說日人主催的書畫展售會的銷售對象是上層有錢的臺、日人，則臺人主催、銷售的對象就是一般平民大眾。

日人在日治時期幾乎每年都會舉辦成果展作為施政宣傳，展出內容包括物產、產業、教育、衛生等。早期這些成果展很少出現所謂的「餘興節目」，一直到1921年底，在日本當局於新竹俱樂部所舉行的物產、教育等成果展上，才開始出現許多餘興節目，包括相撲、活動寫真、生花、盆栽、書畫、骨董、謠曲、舞、三曲合奏會等。⁴⁵這些動態及靜態的藝文及音樂節目，炒熱了現場氣氛，使一個例行的、政治性的、無聊的成果展示會變成一個全民共襄盛舉的休閒娛樂場所，這也是殖民當局的成果展首次結合政治與文藝的一大轉變與典範。此次的展覽包括了書畫展，是由李逸樵與鄭蘊石、周孝軒、張純甫等利用衛生教育展覽會的機會，向島內人徵求書畫作品。中國傳統的書畫展覽能夠進入統治者成果展的場域，算是拜李逸樵所主催之賜，但也應有日本當局的首肯。另一方面，此次書畫展所代表的意義，在於臺人之書畫及骨董已可與其他日人所主導的文藝展件並肩展出。再者，李逸樵在所主催的書畫展期間，選舉辦南音與北音的演奏晚會，既具有「文會」的俱樂部功能，也具有休閒娛樂的功能。⁴⁶

李逸樵循著這樣的結合政治宣傳成果展展出主催古書畫古董展，還有以下的例子：

1924年7月，李逸樵藉新竹衛生教育諸展覽會上，主催古書畫展覽會：「會場假孔子廟大成殿內，以供同好者隨意縱覽，亦百忙中之閒趣也。」⁴⁷參觀此展遂被報紙稱讚為「百忙中之閒趣」。

11月時，李逸樵再藉稻江建醮時間主催書畫展覽：

稻江連日建醮之盛況…陳列書畫骨董，以外城隍廟口前太平町中華會館樓上，有竹人家李逸樵、范耀唐及其女公子范氏佩卿諸氏所主倡之古今名人書畫展覽其間…歡迎一般往觀也。⁴⁸

44.1910年11月10日漢文版報導「陳列骨董」條：「陳列骨董 來十二三日。新起橫街弘法寺。將陳列古書畫及骨董。係自對岸廈門，攜來者。計有四百餘件。多有貴重之品。將以實價發售云。」

45.在 1921年10月11日在《臺灣日日新報》及1921年12月的《臺灣時報》上皆有相關報導。前者為漢文版「新竹書畫展覽會」條，報導出李逸樵等人所主催的書畫古董展。後者在報紙上刊登的時間上有比較晚，且只見日文版。

46.1921年10月20日漢文版的報導「書畫展覽續聞」條。

47.1924年7月12日漢文版的報導「新竹書畫展覽會」條。

48.1924年11月3日漢文版的報導「建醮中書畫展覽」條。

1925年12月：

新竹街欲建祈雨酬恩福醮三日，各處均裝飾醮壇，門巧爭奇。於是新竹街北門書畫家李逸樵氏乘此好機，邀同志署名，搜集多數古今名人書畫，以供嗜好者觀覽。自十八日起五日，開書畫展覽會，其會場假於新竹一公校前，暨城隍廟後，及南門關帝廟內云。⁴⁹

另外斗六街也曾趁物產品評會等公開活動中主催全省青年書畫展：

斗六街將開同郡主催之物產品評會、教育品展覽會、衛生展覽會。該地青年會，乘此好機擬於同時開催全島青年書畫展覽會，出品物一人書畫限一件…⁵⁰

上述之由臺人主催之書畫展覽會，既利用民眾喜愛參與的「新竹衛生教育諸民覽會」、「廟宇做醮」等特殊活動一起展出，同時也選擇開闊場域，讓一般民眾能「免費」參觀，報紙也多以「消暑」、「閒趣」來形容這個休閒活動。⁵¹如此，既可將書畫作品普及於一般民眾（兼具知識性與娛樂性）、促使民眾親近中國傳統書畫作品，也提供了民眾書畫收藏的機會與管道。若以此觀點而言，李逸樵不僅具有前瞻眼光、精明的生意頭腦、主催書畫展及促銷書畫的能力，也對日治前期臺灣傳統書畫的普及及發展饒有貢獻。

至於報紙對於「書畫展覽」的記載，除了上述所言，自日本始政開始到1905年間幾乎只有日文版，要到1905年開始，也許因有臺籍書畫家的參與，才出現日、漢文版兼有的報導，⁵²但事實上兩者的報導並不同步，漢文版多晚日文版一兩天，且內容較日文版簡略並有些差異。另外，即使是日文版的報導，「擡頭主題」大多還是寫漢文，似乎還是給大多數識字的臺、日人看的。其中的原因，令人好奇。

（四）作為商業活動的平台

書畫展覽會的舉辦，除了將作品公開展示給觀眾，最重要的是作為商業活動的平台，是當時重要的藝術市場。賣方通常利用報紙為其展覽作宣傳，包括展場地點、展期、展品介紹以及展品售價等；有興趣的買方則會持續關注報紙上的相關報導，甚至訂閱骨董相關刊物補充專業知識，成為追逐書畫展覽的特別的族群。此藝術市場因《臺灣日日新報》的人力報導而日益熱絡，買方與賣方在此市場各取所需。由於展品往往售價不賡，販售所得便成為當時重要的藝術經濟的一部分。比較

49.1925年12月4日漢文版的報導「新竹書畫展覽」條。

50.1924年11月12日漢文版的報導「諸羅特訊／書畫展覽會」條。

51.1919年8月漢文版報導「古書畫展覽一瞥」條，是針對林熊光在博物館所主催的古書畫展：「時下本島人株（殊）熱臻於絕頂，易若扶杖往觀撲去俗塵三斗，勝服尋常之清涼劑百幅也。」；1924年7月12日漢文版報導「新竹書畫展覽會」條：「亦百忙中之閒趣也。」日人還有專門的「納涼會」的舉辦，見蔣竹山，〈空間、休閒與大眾文化〉，《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2014年4月，頁224-231。

52.當時另一份報紙《臺灣時報》卻還是只有日文版的報導。

起來，通常古書畫的展覽比今畫家的書畫展更受歡迎，價錢也更高，入場券往往一票難求，展品有時更是頃刻售出，以致於吸引了許多日本內地以及大陸的書畫家以及書畫收藏家來到臺灣開展。

二、書畫展覽會的商業運作模式

（一）展品販售方式

當時舉辦的書畫展覽會，不論是古今書畫作品，或者現場的揮毫作品，大都是以「出售」為主要目的，以「展示」為次要目的（當時有賣品及非賣品），且隨著書畫展覽的販賣與牟利目的的日益擴張，展覽會的主催者漸漸擴大到由日、臺聯合主催、臺人主催，場地從台北擴展到彰化（1907年小林松隈在彰化俱樂部開古今書畫展始）、嘉義（1909年日本畫家須賀在此開展）、臺南（1911年臺南公館古今書畫展始）、高雄（當時稱打狗，1913年自玉置塊北收藏書畫展始）以及新竹（1915年李逸樵主催始）。從書畫展覽會的場地的擴大，就可看出書畫展覽的商業利益之日益膨脹。

報載書畫展覽會常見「出品者」與「出品」（「展出品」的簡稱），其中「出品者」指的是參展的書畫家或收藏家，「出品」指的是展出的書畫或古書畫，並以「點數」或「枚」代表出品的「件數」。由於書畫展的目的大多是為了售出展示的書畫作品，故每個展品大多會有標示價格（少數無標價，可議價），價格由所謂的「專家」訂定，若是現代畫家的書畫展，則由畫家自訂。展場上的展品有時會有「賣品」及「非賣品」之別。例如1908年的日籍書畫家的展覽會上，古董書畫品有分為「賣品」及「非賣品」；1915年一個在新竹寺展出的書畫展覽上，也同時展出「賣品」及「非賣品」。⁵³

當時書畫展覽會有幾種銷售展品的方式，第一種是購買「入場券」，入場參觀。例如，1919年11月「臺灣書畫會」開展，會中有發售入場券，報載的盛況：

…赴會者非常盛況。其入場券原限二百餘張，數日前即已賣完，是日早朝，在會場請入場券者頗多，臨時再發數十張。…赴會者三百餘人，揮毫多至千五百餘張。⁵⁴

但並非所有展覽都需購買入場券，很多是免費參觀，若想購買作品再買揮毫券或跟主催者接洽。⁵⁵

第二種是購買「揮毫券」，即參觀者必須事先購買「揮毫券」，作為入場並購

53.1908年11月6日及1915年4月3日日文版報導「書畫古董陳列會」條。

54.1909年11月26日漢文版報導「書畫會況」條。

55.1908年11月5日漢文版報導「共進書畫 來八日午前十時頃，臺北書畫家將在共進會八月樓上為席上揮毫會，入場者不取資。惟欲翰墨者，則就樓下先購揮毫券。如揮毫所用紙絹等。亦可於樓下隨意買之。」

買展品，或者購買展出者本人或來賓的當場揮毫的「現場即席之作」。有時也可以去參加現場的揮毫會，但必須繳交「入會金」。

揮毫券的價格有20錢、50錢到1圓不等。最早有關於揮毫券的記載跟要價，見於1903年3月在丸中溫泉的宮田英春氏書畫展，現場並有「臺灣書畫會」的成員如武部竹令氏、狩野勇讓氏等參與，並即席揮毫。當時發行的揮毫券一券以20錢計；⁵⁶1906年「臺灣書畫會」在臺北俱樂部舉辦的例行會中，一券50錢：

…在臺書畫各先生共為席上揮毫會，惟必持有揮毫券，乃可參列。該揮毫券每枚五十錢。在該部賣出之。⁵⁷

1907年臺北俱樂部的書畫會，揮毫券一枚20錢、⁵⁸同年村瀨義德畫伯的畫展上的揮毫券，一份1圓。⁵⁹1908年11月在八角樓舉辦的共進會的書畫展上，需在樓下購買揮毫券才能購買展品。⁶⁰揮毫券一份50錢，價格刊登在三天後的報紙上：

有古書畫展覽竝席上揮毫會，蓋將以應眾人之求也。嗣以果如此，則不獨出席家不勝其煩，且恐應人求而不能，故定為制限。賣揮毫券一枚五十錢，數限二百枚，概以書院街表禎師神島承辦之。⁶¹

故知揮毫券從1903年一份20錢，到1907年的一份50錢到1圓，三年漲幅達2.5倍，可見得書畫展覽的利益可觀。

至於現場繳入會金，見於1909年11月18日的報載，當時由日本畫家河原紈年及那須豐慶來臺開「臺灣書畫秋季大會」，開放給臺灣的臺、日籍書畫家參與，但要收會費金1圓。並在入場券上附以陳列書畫抽籤券一枚、書畫席上揮毫券五枚，赴會者得以隨意揮毫；⁶²1917年1月「臺灣書畫會」也舉辦同好繳交入會金現場揮毫，當時入會金為3圓50錢，然後以抽籤決定取得資格。⁶³

第三種銷售方式為購買「抽籤券」，因為展覽會上常常參觀者眾，而現場的展品有限，為了公平起見，參觀者必須參與抽籤來決定是否可以取得或購得「揮毫作品」。「抽籤券」可經由預約或展覽現場購得。茲用以下兩則為例：

臺灣書畫會定以十八日開於丸中溫泉。前報既詳言之。茲聞日來之請為會員者，為數甚多，因餘興抽籤，只限為四十枚。一昨日中既預約三十餘枚矣，其餘僅剩十枚許。此後之請預約者，必捷足方可得也。…⁶⁴

56.1903年3月24日日文版報導「淡水館の古書畫と席上揮毫」條。

57.1906年12月26日漢文版報導「臺北俱樂部之書畫展覽會」條。

58.1907年1月5日日文版報導「臺北俱樂部之書畫展覽會」條。

59.1907年7月14日日文版報導「展畫の抽籤と席上揮毫」條。

60.1908年11月5日漢文版報導「共進書畫」條。

61.1908年11月7日日文版報導「共進會の書畫會」條。11月8日的漢文版報導。

62.1909年11月18日漢文版報導「臺灣書畫秋季大會」條。

63.1917年1月16日日文版的報導「新畫抽籤畫會」條。

64.1906年11月14日漢文版報導「書畫會及抽籤券」條。

後續報導：

去十八日，在新起橫街丸中溫泉催開之臺灣書畫會。…在席上揮毫。…及列餘興抽籤，百餘名之來會者，各乎求畫家書家之揮毫。午后四時三十分頃。為餘興之抽籤。…。其購餘興抽籤之四十餘名，再齊集抽籤，以決選該玉章筆之山水，既由會主致書通知矣。⁶⁵

有些畫家會直接就舉辦「抽籤畫（會）」，增加競購的刺激感，抽籤券的功能類似，但價更高。1909年富田溪仙畫伯在新起橫街丸中溫泉舉行「展畫抽籤」，共提供畫作50張，照抽籤每張訂價7圓，限定50人；⁶⁶李逸樵與范耀庚等人於1915年在新竹的衛生展覽會期間，也舉辦過書畫揮毫會，大概是臺籍書畫家獨立主催的、最早的書畫揮毫會；⁶⁷「臺灣書畫會」在1917年1月也舉辦過抽籤畫會。⁶⁸

另有一種比較少見的銷售噱頭，類似「標售」，由欲購者寫下價錢，再行開標，最高價者得標。「標售」最早見於1910年6月26日日籍收藏家愛知縣島田氏在臺北俱樂部的展售：

自午前八時始。至午後六時止。陳列於臺北俱樂部。供人觀覽。且就地發售。惟價不為定。任欲購取者。自就其物的價。以片紙書之。納諸竹筒中。於念七日午後六時。公同檢閱。其的（得）價最高者。則如其價而之。雖值百圓之物。為的（得）一二圓。亦不為多索。此例為前此書畫會所無。且前此皆為新書畫。此次則搜羅舊物。而購與不購。又任人之意。有斯癖者。其奮而往觀口。⁶⁹

書畫展覽的主要目的就是商業買賣，但常被包裝在文藝活動中。如上述的1915年始政紀念日上，《臺灣日日新報》經由日本官方同意，將展場設於教育展覽會裡的參考室，⁷⁰六日後再將部分展品展於南門督府國語學校，此展乃是向全臺灣日籍及臺籍書畫家募集作品：

出品點數二百餘，頗集全島精華，但其中專門者較少，如畫家則以高橋菱雨、台南後藤藤月、呂璧松、鹿野金華…頗屬專門，書家則鄭鴻猷之外素有定評之人，亦多出品。專門有專門之筆致，素人亦有一種妙不可言之風韻，頗難一一評之。…⁷¹

65.1906年11月22日漢文版報導「臺灣書畫會之景況」條。

66.1909年5月16日漢文版報導「抽籤畫會」條。

67.1915年4月3日日文版報導「衛生展覽會彙報 書畫揮毫會」條。

68.1917年1月16日日文版報導「新畫抽籤畫會」條、1月27日日文版報導「抽籤畫會陳列會」條、2月5日日文版後續報導「臺灣書畫會 繪畫百七十餘枚 抽籤」條、2月7日漢文版後續報導「臺灣書畫會」條。

69.1910年5月26日漢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條。

70.1915年6月10日漢文版報導「教育品展覽會 / 全島書畫展覽會」條。

71.1915年6月22日日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會 本社募集の」條及23日的漢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會一瞥」條。

當時《臺灣日日新報》還特地用日、漢文兩版推銷展出品，聲稱有些雖然不出售，但報社「不惜與之周旋之也」。⁷²

也有許多書畫展覽會是免費參觀的，尤其是臺籍人士主催的、在開放空間展出的展覽。另外，大多數臺籍骨董商的展示會或展示館都是免費參觀，要購買時再依照展品上的標價購買，或再跟骨董商洽談。除了上述新竹的莊樹芬與莊樹勳的狀況，臺南書畫骨董商山野新七郎在氏曾在臺南書院街開店，店名為新山堂，以樓上為陳列場供一般娛樂參觀，並行販售。⁷³

（二）展品的訂價

至於一幅書畫作品大概值多少錢？價錢高低有古、今，及中、日、臺之分，「身價」因人而異。通常古今書畫展場上的訂價號稱由「專家」認定，個人展場上的應該是自訂，而骨董書畫的價錢則由收藏家自訂。

1908年4月12日日本南畫家石川柳城於臺北俱樂部舉行的書畫展覽會，其中「佐久間督憲畫山水大作三幅，每幅皆九十圓」，佐久間督憲是當時的臺灣總督（1906-1915），他跟石川柳城所訂的3幅大山水，每幅都要價90圓，石川算是日本今畫家中身價較高的畫家。1910年5月，報載未指明主辦單位的古書畫展覽會，日本「古畫家」作品的開價為一幅200圓。⁷⁴1911年4月關於日本收藏家富倉家書畫古董的報導，巨勢金岡的作品值1萬百圓、木米山水及山陽書兩幅值4千6百69圓、田中光顯的藏品也多在千圓上下。⁷⁵1910年11月在新起橫街的弘法寺所展售的收藏品，王石谷的山水值2百圓。⁷⁶以上數例即可看出身價之高低。

相對的，臺籍書畫家的行情就比較差，尤其募款的書畫作品的訂價，大多會「從廉」，⁷⁷每幅平均在50錢以上到5圓以下，以便於中低階層的民眾能負擔得起並能花小錢做善事。1923年10月臺灣書畫家捐贈募款展覽會，共售出160點（件），得176圓，等於平均一幅作品只賣1圓多。但其中另售的書法家李逸樵的書法潤筆費則訂為25圓、洪以南的為20圓，相對是高價。⁷⁸

福州骨董商崇高堂主人的書畫古董出品，價格在3圓到5圓之間。⁷⁹

72.1915年6月15日日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會」條，6月16日為漢文版報導「紀念日當日書畫展覽會」條。
73.1911年10月22日漢文版報導「古董陳列」條。
74.1910年5月26日日文版報導「古書畫展覽會」條。
75.1911年4月13日漢文版報導「書畫骨董現價」條。
76.1910年11月13日漢文版報導「書畫骨董」條。
77.1924年6月28日漢文版報導「中報主開書畫展覽」條：「為期三日，就中書畫為本島人罕居多，每幅附札，五十錢以上五圓以下，希望者即售之。現大半均賣了，共售金除時費外，將寄慈善事業云。」
78.1923年10月，臺灣22名收藏家捐出書畫義捐救助日本關東大地震展覽會的行情。
79.1911年9月8日日文版、9日漢文版的報導「書畫古董陳列」條。

1935年7月為臺灣新竹及臺中兩地4月的大地震的募款書畫展中，中國前清碩學顯宦親筆揮毫書畫333張，以及滿州特以書畫展覽義賣義捐金：

作品從廉定價，種類分作三十圓、二十圓、十五圓及十圓四種，其中不乏有垂涎者，希望各收藏家奮發往購，不落人後，亦滿臺相互聯絡親善之一道。⁸⁰
這些義賣作品最便宜也要10圓，也許是因為「出品者」曾是前清大官，所以身價不凡。

書畫展覽會通常會在展覽之前先經由報紙來作宣傳，並預告展出者、展出的點數（件數），之後還會報導最終成交的點數，作為展覽成功與否的指標。通常要百點以上才算是成功的大展。

1906年2月在基隆公會堂所舉辦的書畫展覽會，共出品200點，以及明信片4,000多枚（點），參觀者6、700人，號稱盛況空前。⁸¹上述1915年1月日本基督教會為鎌倉小兒保育園來臺所舉辦的慈善書畫展，出品約300點，算是大型展覽。1915年6月，《臺灣日日新報》利用日始政紀念日之時主催的日本及臺灣書畫展出品點數200餘點，也號稱是集合全島精華的大展。而上述1923年的賑災展覽售出160點，也算大展。1926年9月於臺北博物館樓上公開中之謝瑄樵、呂世宜兩氏遺品展覽上分別由臺、日的收藏家提供關於謝瑄樵、呂世宜的作品，共計約150點，⁸²差可算是一個大展。

（三）作為慈善募款的重要手段

由於書畫展覽的販賣所得是重要的財源，故常成為慈善募款的必要手段，且要到1914年之後才比較頻繁，可能跟當時臺灣人的生活水準提高到一定的水準、臺灣人與日本人在被殖民與殖民者之間的情感漸見深厚等因素有關。但因當時的慈善書畫展的報導仍大多為日文版，故推測募款對象仍是在臺日人及有錢階級的臺人，因這些人比較有財力購買書畫作品，也比較能達到募款的目的。

1914年2月14日鎌倉小兒保育園主佐竹音次郎氏從日本渡海來臺，攜帶日本朝野名流大家寄贈書畫數百點，於當地鐵道旅館展出並出售，所得寄保育園為園之維持費。⁸³同年4月再渡海來臺募款，報紙的報導乃以「慈善書畫展覽會」稱之。⁸⁴隔年12月8日，日本基督教會再為了鎌倉小兒保育園來臺於「臺北俱樂部」展出日本

80.1935年7月24日的漢文版報導「完台灣地震義捐金 滿州圖書畫展覽會」條。
81.1906年2月19日中文版的報導，2月20日日文版的報導，其中日文版的報導非常詳細，主題皆為「基隆の書畫展覽會」條。
82.1926年8月28日漢文版報導的「新竹 / 書畫出品」條。
83.1914年2月14日日文版的報導「保育園書畫展覽」條，次日以「鐵道旅館書畫展覽」為主題以漢文版報導。其中特別刊出「每幅皆附定價」。
84.1914年4月5日日文版的報導「慈善書畫展覽會」條。

書畫家作品，販售所得作為慈善金，報載仍以「慈善書畫展覽會」為題，隔兩日出刊漢文版報導。⁸⁵

稍晚的慈善書畫展有1920年尾崎秀真與魏清德等人為李逸樵主催紀念展，所得捐贈慈善事業；⁸⁶ 1923年10月臺灣22名收藏家舉辦義捐救助日本關東大地震的書畫展覽會，此次展覽會盛況空前，非常受到當時社會的重視，從展覽前一日由日文版刊出，加上接連的相關報導，共5天、8則報導。⁸⁷同年11月17日，鎌倉小兒保育園為關東大地震再度來臺舉辦展覽會募款救災；⁸⁸ 1924年由臺灣新聞社所主開書畫展覽，所得除了支付必要的費用之外，其餘將寄慈善事業。⁸⁹

（四）助長收藏風氣

臺灣古董書畫收藏開始與盛行的時間還沒有專文做過討論，但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最早的相關報導，為1907年及1908年對於臺南的骨董書畫收藏情況的報導，且都關注於膺贗品氾濫的問題：

臺南近於書畫骨董諸品。極其流行。其熱度殆臻絕頂。故貯藏之者亦隨之而益多。且時開陳列會。將所寄之奇玩古器。互相品騭。于背後則盛為買賣。每月必兩三次如是。與其會者非官即紳。其聚會亦常在官若紳所居之深處。乃不謂於此之間竟有一種奇怪之風說。即以此道之鑑定家。中有稍負德望之臺南紳士。不獨墜入東京某奸商及該地某奸商與某甲等之術中…常有不值數十錢。而獲百圓之厚利者。如此手段苟有四五百圓之雜品。勢必賣至二三千圓而無難…。⁹⁰

此報導提到，臺南對於書畫骨董的收藏非常流行，雖然有所謂的官紳鑑定過，但仍會被東京跟當地的奸商所蒙騙，故常有用高價買到超過原本價格的情事。1908年的報導：

在日治初期的啟蒙，骨董家現臺南市內有數十間。亦云盛矣。聞此生意。利源太長。或云有倍蓰之利。或云有三倍之利。或云有什佰之利。蓋骨董之物。多出於官宦鉅紳巨賈之家。名人乃有名物。凌替後一遇非守成之子弟。遂以祖若守所建之物。非已所願愛。而變賣之。或遇孀居之婦女。不知珍惜

而棄卻之。不論價值得有多少利。便喜之不勝。一入骨董家之手。即聲價抬有十倍。

清時枋橋頭街一二間。草花街亦一二間。凡有古書畫以及彝鼎諸器物。有蒼古者皆收置之。以待顧客。亦有受人托賣者。

現時骨董家。內地人側居多。其羅列亦較整頓。每日出為本島人家搜羅。如有古銅器古磁器以及古竹器希奇諸物。願而樂之。必欲得之以為可居。若舊時小試之入場藍。並大家所調製其祖先塗像。亦收買若干。是誠不可解解云。⁹¹

此文呼應1907年對臺南地區收藏家頗多的報導。這應跟明鄭治理臺灣時在臺南赤崁設立承天府作為首善之都並積極經營有關。當時臺灣收藏家所收藏的書畫骨董悉從大陸而來，而臺南安平港占了地利之便。這些古物被骨董家收藏後，價錢可以翻十倍之多，暴利驚人，也難怪骨董書畫收藏及展售的風氣會這麼盛行。只是在唯利是圖的風氣下，假貨出現的情況就會非常普遍，在《臺灣日日新報》裡常見相關報導，尤其在公開徵件展時，更強調會有專人作鑑定以免贗品摻雜。

例如1913年1月臺灣書畫會主催的徵件展覽會的報導：

臺灣書畫會，以臺北古書畫現在十分流行，其間似是而非之物，流入甚多。特訂於十二日前九時至午後四時，開該古書畫展晚會，蒐集珍藏密什於鐵道旅館，為斯屆參考品。有志出品者限至十日提出撫台街如雲庵佐橋冠左處。屆時將集會園中特具此種鑑識者慎重鑑別，以定真偽也。⁹²

此次展出品有「荊關倪黃之珍、王蘇趙李之秀，當然能於萬千之中，獨標異彩，給觀眾之眼福云。」但從目前的鑑定眼光看來，當時所謂的「荊關倪黃之珍、王蘇趙李之秀」仍是贗品居多。

另外，當時收藏風氣之興盛也應跟日本在臺發行的報章雜誌的宣傳與介紹有關。1907年9月在臺發行的新刊物中，首見由東京的書畫骨董雜誌所出版的《書畫骨董雜誌》，主要介紹日本方面所收藏的書畫骨董。此雜誌約每隔兩個月在臺灣發售，但在1916-1920年間的報導顯著減少，最後的報導為1920年底。⁹³此雜誌在1907年出版時售價為5錢，到了1920年已經漲到35錢，漲幅頗大。

1912年尾崎秀真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連載《古今書畫名蹟》，介紹中日書畫家，但以日本書畫家作品為主。1915年《臺灣日日新報》有三次刊登王少濤的

91.1908年1月28日漢文版報導「赤崁庵音／搜羅骨董」條。

92.1913年1月8日漢文版報導「古書畫展覽會」條。

93.1907年9月12日日文版報導「書畫骨董雜誌」（十一）條，出版者為書畫骨董雜誌社，地址為東京駒込東片町。此出版社的地址及在臺售價都經過幾次的變動，到《臺灣日日新報》關於此雜誌的最後一次的新刊物報導時間1920年12月4日（第百五十號）時，出版者地址改為東京麻布區喜多町。

收藏品，⁹⁴1916年有兩次刊登張純甫收藏品。⁹⁵繼尾崎秀真之後，魏清德自1922年開始在報上以〈潤庵漫筆〉及〈忙中系列〉發表關於臺灣早期書畫家以及自己的收藏情形。⁹⁶仔細研究《魏清德舊畫收藏》裡所刊出的魏清德收藏品，可以發現，他的收藏品有很大部分來自林熊光的收藏轉贈，一小部分來自日人的贈與，例如山本竟山、尾崎秀真。而這些雜誌及報上關於書畫作品的介紹與賞析，對臺灣的一般民眾在建立書畫知識及審美觀上具有教育的功能。

那些日治初期由日人主催的書畫展覽會，對臺灣民眾同樣具有教育意義。整個日治前期（1901-1927）在臺灣所舉辦的諸多大大小小的書畫展覽會，則廣開臺灣人的眼界，⁹⁷除了進一步了解展覽會的形式、學會欣賞書畫展覽內容，也讓臺灣人看到了書畫展覽的商機，進而助長了臺籍人士的收藏風氣。

當時臺籍較重要的收藏家，除了前述的新竹的李逸樵之外，臺北以板橋林家花園林熊光為代表，他被當時《臺灣日日新報》譽為「本島人唯一書畫收藏家」。⁹⁸林家自清初以來就是臺灣著名的富豪，家藏豐富，又因擁有板橋三先生珍貴的作品遺留以及珍藏呂世宜所協助購買之萬本書籍、拓碑作品，成為當時全臺最大的收藏家族。

王熊光在林家花園內建造「天師壇」，用來陳列他的收藏品。⁹⁹且自認負有宣揚家族傳統的使命，努力的成果包括：1922年左右重金購回林本源舊藏的呂西村刻版、1930年曾提議舉辦中國古代藝術展覽會，雖未如願，卻看出他的用心、1935年日本舉辦統治臺灣四十周年紀念的臺灣博覽會，林熊光曾在林家定靜堂作為「鄉土館」展覽展出家族的豐富書畫古董收藏。¹⁰⁰

1919年8月林熊光在臺北博物館主催古書畫陳列會，此次展覽有日文及漢文版的報導，漢文版並對此展大加讚賞，並有讀者投書觀看心得。¹⁰¹

如上所述，1925年6月林熊光與日人尾崎秀真、荒井賢次郎、杉坂六三郎四氏共同主催始政三十年紀念書畫展覽會於高雄。¹⁰²《臺灣日日新報》在後續報導中，稱讚林熊光為當時公認的鑑定家，與尾崎秀真等三位日本人並稱。1926年9月林熊光與尾崎秀真再次合作舉辦了謝琯樵與呂世宜遺墨展。¹⁰³

臺北的重要收藏家還有王少濤，從1915年《臺灣日日新報》三次刊登王少濤的收藏品，¹⁰⁴可見他的書畫收藏事業至少在1915年就已經開始。余美玲在對王少濤的書畫藝術的論文中稍微提及了他的收藏事業。¹⁰⁵王少濤1920年攜眷移居汕頭，1922年從汕頭回臺定居艋舺，並帶回許多書畫古董收藏，當時《臺灣日日新報》曾為他大肆宣傳。¹⁰⁶年底時王少濤利用板橋建醮期間，在板橋車站內的「北海山公會堂」舉辦書畫會。當時吳鳳生、黃璞庵正在新公園內「臺北博物館」聯展，王少濤就邀請兩位到展覽場上現場揮毫：

適有土城人骨董商王少濤氏，由汕頭歸來，所有收藏之書畫亦擬陳列。而且汕頭吳鳳生、黃璞庵二畫家，現在博物館揮毫，亦以板橋有志者之請，特擬在場內揮毫，以應一般人士之求也。¹⁰⁷

1927年王少濤與尾崎秀真在大稻埕蓬萊閣合催書畫展覽：

此回有內臺人書畫收藏家尾崎古村、王雲滄諸氏主催，會場假大稻埕蓬萊閣...¹⁰⁸

此次展覽造成轟動，並有兩則後續報導。

另一位臺北收藏家是張純甫，如上所述，《臺灣日日新報》在1916年就刊登過他所收藏的何維樸的書法與謝琯樵的繪畫，¹⁰⁹故知於此前他應該就已收藏古書畫作品。他並在1929-30年於臺北永樂市場開書畫買賣店。¹¹⁰報載他所主辦的書畫

94.1915年9月22日、1915年10月16日、1915年10月27日《覺禪的竹扇面》的報導。另《王少濤年譜》記載：「在1915年時，友人許南英及稱其『收藏書畫甚富』、友人施士洁稱其『精玩古物，若金石書畫之屬，同弗尋究而殫藏之。』」
95.1916年12月16日刊登《何維樸書法扇面》、1916年12月28日刊登《謝琯樵墨蘭》。
96.謝世英，〈由魏清德《臺灣日日新報》〈忙中賞心錄〉談中日臺書畫交流〉，《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2009年5月，頁41-54。
97.1925年6月20日報紙對於林熊光等三人主催的書畫展漢文版中提到：「…有志於東洋在來藝術，及園界擴充、涵養高尚趣味之人，不可不日撥忙往觀。」
98.1925年6月12日「無腔笛」漢文版報導。
99.1922年12月30日漢文版報導「板橋建醮盛況 / 天師壇」條。
100.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2007年12月，頁120、〈魏清德收藏年表〉，收入《魏清德舊藏書畫》，1919年條。林熊光等台北收藏家古書畫展於博物館、1930年條、1935年條。
101.1919年8月3日日文版報導「古書畫陳列 五六日在博物館」條、8月4日漢文版報導，「古書畫陳列 五六日在博物館」條，後續報導有8月5日日文版報導「支那古書畫陳列」條、8月6日日文版「古書畫展覽一瞥」條、漢文版報導「支那古書畫概觀」條（讀者投書）。

102.1925年6月20日漢文版報導「書畫展覽會」條。
103.1926年8月28日漢文版報導「新竹/書畫出品」條，此報導在說明兩人說服新竹收藏家李逸樵提供謝、呂兩人的遺墨，其他相關報導有1926年9月7日漢文版報導「謝呂二氏書畫品展覽會光景」條。
104.1915年9月22日、1915年10月16日、1915年10月27日《覺禪的竹扇面》的報導。另《王少濤年譜》記載：「在1915年時，友人許南英及稱其『收藏書畫甚富』、友人施士洁稱其『精玩古物，若金石書畫之屬，同弗尋究而殫藏之。』」
105.余美玲，〈日治時期滬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頁27-82。
106.1922年1月6日的漢文版報導「書畫滿載」條。亦可見余美玲，〈日治時期滬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頁33。
107.1922年12月16日的漢文版報導。12月26日到30日，上午10時至下午2時展出。1922年12月30日的後續漢文版報導「書畫會」條，記載展出並沒有很成功，參觀者稀少。
108.1927年6月23日漢文版報導「支那書畫展覽 本日起在蓬萊閣」條、1927年6月25日漢文版報導「書畫陳列會」條、1927年6月26日漢文版後續報導「蓬萊閣古書畫 陳列盛況」條。
109.1916年12月16日刊登《何維樸書法扇面》、1916年12月28日刊登《謝琯樵墨蘭》。
110.〈魏清德收藏年表〉，收入《魏清德舊藏書畫》，1929、1931年條。

展在1929年有兩次，一次是11月：

臺北詩人張純甫氏，將在18、19兩日間，假臺中紀念館，開古今名人書畫展覽會，點數約五十餘，一部分為愛好家購去。¹¹¹

另一次是12月，¹¹²此次的報導篇幅相對較小。1930年張純甫再從大陸京、津收購書畫回臺辦展售會。¹¹³不過張純甫的收藏展已經是日治後期的事情，且古今書畫展的興頭似乎已日益走入衰退。

另一位北部收藏家為蔡宜甫，他在1925年趁日本始政三十周年時在臺北開書畫館，並為開館在報紙上刊出「臺北書畫館序」，¹¹⁴文中宣告在館內展示收藏書畫品，也請書畫家揮毫，將作品懸掛館內供臨觀。

其他往來大陸的骨董商則大多在自宅、大街、骨董店裡展售所收購的書畫古董。新竹街寫真師莊樹芬從南中國蒐羅今古書畫作品，便公開陳列於當街之添容館「…（藏品）大為某內地人所垂涎，但費價頗高，未易出售云。」；¹¹⁵新竹莊樹勳，從泉州收購回來，在自宅寫真館樓上展售¹¹⁶、臺中永和齋裱店施壽伯骨董商，在城隍爺繞境之日，開設書畫陳列會，供一般人參觀，並從廉出售。¹¹⁷

以販賣為目的、由臺日骨董商所主催的「骨董書畫展覽會」（或稱「骨董書畫陳列會」）在當時的盛況不亞於一般由書畫家或書畫收藏家所主催的書畫展，但展覽時間較晚。最早的報導為1908年10月的共進會所主催的書畫骨董展覽。¹¹⁸在展場上除了骨董商自行標價之外，也有所謂的「競賣」，¹¹⁹跟現在的拍賣會類似。另外，這些骨董商還會聯展，或者交換收藏品，稱為「骨董交換會」（報載標題也有只稱為「骨董交換」）。¹²⁰

結語

日治初期由日本人開始主催的書畫展覽會（不論古今書畫），剛開始主要作為日人的社交場域，慢慢邀請臺籍書畫家一起參與，並藉此作為臺、日上層社會階級人士的互動與聯誼之場域。且由於書畫骨董的展覽會皆以銷售為主要目的，商機無限，便逐漸成為可以募款或牟利的場所，也因此有越來越多的「有志之士」（日人

主催、臺日人合辦、臺人主催）加入主催各種型式（個展、聯展、徵展等）及規模大小不等的古今書畫展（有時包括骨董器物）。這些書畫展在當時所具有的功能至少包括政治目的、社交、娛樂。而商業活動對當時社會的貢獻除了是藝術經濟的一環，也是慈善募款的手段。書畫展覽在當時仍算是特殊階級的專屬藝文及商業活動，要1920年代中期才有較多的一般臺灣民眾參與，且以李逸樵積極主催的展覽會為開端。

這些書畫展覽會從「展示」進而「販售」，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的現代化的影響，以及1872年日本國內首次博覽會之後衍生出來的活動，¹²¹因為日治臺灣而將這種活動移植到臺灣島來，臺灣「恭逢其時」，除了啟發臺籍書畫家，也助長了臺灣當時書畫骨董收藏風氣的萌芽及興盛。它們原來依附在博覽會中，後來獨立成為重要的展覽，並在臺灣進行了二十多年（從1901-1927）的「示範」與「教育」，對當時藝術環境的營造、提升臺灣人民對古書畫的鑑賞興趣與能力、提供日治時期臺灣的本土書畫家豐富的土壤等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

日治前期這二十多年的書畫展覽會有許多精采的呈現，本文所舉之例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盼能拋磚引玉，吸引更多研究者的目光，能對這段歷史有更多的關注。再者，本文試著跳脫傳統對書畫展覽只著重於文化面向的思維，從社會及經濟實用面切入，將書畫展覽會視為大眾文化的一部份，¹²²且是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希望以不同的視角，找出這些書畫展覽會對當時社會的諸多功能，以及那些主催者的歷史貢獻。

後記

本文引用之《臺灣日日新報》，乃經由《漢珍知識網：報紙篇》的電子資料庫，關鍵字為「書畫」、「書畫展」、「揮毫」、「揮毫券」、「抽籤」、「餘興節目」、「共進會」等。關鍵字不同，即使是一字之差，出現的資料內容就有一些差別，故往往需要重複檢視。引用的報紙有些有註記編號，大多數無，故文中所引，若有註記編號，則以編號記之，若無，則以刊登日期及版面上的主題為主。🔪

致謝：本文引用的資料有些為日文版，承蒙日籍同學石垣美幸及學弟邱維邦的日文翻譯協助，在此致謝。

121. 為了隔年1873年的維也納萬國博覽會預作準備的展覽，在湯島聖堂大成殿舉行，此次展覽陳列了書畫、古董、動植物標本等。參見日本東京博物館歷史沿革。

122. 在蔣竹山所編輯的《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中並沒有收入書畫展覽會的活動，因為他未跨入美術史的範疇，非常可惜。如果將它收入，日治時期的大眾文化的介紹就更為完整。由此亦可見美術史應該更積極的跨界文化史。見蔣竹山，《島嶼浮世繪——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2014年4月，頁224-231。

參考書目

王尚義，瀛社，雲滄（王少濤）年譜，<http://www.tpps.org.tw/forum/portal.php?mod=view&aid=20&page=3>（2014年5月瀏覽）

王慧瑜，《日治時期臺北地區日本人的物質生活（1895-1937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10年。

王鐵軍，〈風雲與書墨：典藏20世紀初期日人書畫中的東亞文化共同體〉，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34-39。

卞鳳奎〈洪以南對新思潮受容之探討〉，《臺北文獻》第168期，2009年6月，頁239-258。

李婉甄，《藝術潮流的衝擊與交會：日治時期魏清德的論述與收藏》，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年。

林雅娟，《日治時期新竹地區水墨畫發展之研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術系碩士論文，1999年。

吳文星，〈談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書畫存續流變之背景：代導論〉，收入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22-25。

余美玲，〈日治時期傳統文人魏清德的書畫活動與南宗風尚之探析〉，《臺灣古典文學研究集刊》，2010年12月，頁291-293，295-359；余美玲，〈日治時期瀛社詩人王少濤的書畫活動與藝術探析〉，《臺灣文學研究集刊》第7期，2010年2月，頁27-82。

呂紹理，〈展示臺灣：一九〇三年大阪內國勸業博覽會臺灣館之研究〉，《臺灣史研究》第9卷第2期，2002年12月1日，頁103-144。

麥青龔，〈清代臺灣書壇之光板橋林家三先生 呂世宜、謝琯樞、葉化成〉，《北縣文化》，民國95年6月，頁4-16。

香取潤哉，《「昭和書豪」山本竟山 日本治臺時期旅臺書家研究》，國立臺灣藝術大學藝術研究史碩士論文，2006年。

陳秀文，〈日治時代的臺灣美術運動 一種政治思考〉，《美育》第198期，2014年3月，頁75-77。

陳其澎，〈十九世紀萬國博覽會的殖民意涵〉，《設計學研究》第8卷第2期，2005年12月1日，頁81-97。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魏清德舊藏書畫》，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2007年11月。

許俊雅，〈從舊學到新學 知識分子的啟蒙與藝文活動〉，《文訊》第341期，2014年3月，頁96-99。

黃冬富，〈日治時期臺灣東洋畫風之發展〉，收入國立臺灣美術館「台灣美術丹露」主題網站<http://taiwaneseart.ntmofa.gov.tw/chiindex.html>；國家文化資料庫。（2014年5月瀏覽）

黃美娥，〈北臺文學之冠 清代竹塹地區的文人及其文學活動〉，《臺灣史研究》第5卷第1期，1998年6月，頁91-139。

黃琪惠，《日治時期臺灣傳統繪畫與近代美術潮流的衝擊》，國立臺灣大學藝術研究史博士論文，2012年；黃琪惠，〈臺灣書畫收藏展與傳統文化再詮釋〉，《史物論壇》，2007年12月，頁111-139。

黃華源，〈清末到日治時期（1885-1945）社會變遷下台灣書法之考察〉，《書畫藝術學刊》第10期，2011年6月，頁153-218。

程佳惠，《1935年台灣博覽會之研究》，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

《臺灣早期書畫展圖錄》，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組編輯，臺北市，國立歷史博物館，1995年。

楊儒賓主編，《瀛海掇英：臺灣日人書畫圖錄》，新竹市，清華大學出版社，2013年。

楊雅慧，〈洪騰雲與洪以南〉，《臺北人物誌》第1冊，臺北市政府，民國89年11月，頁176-181。

葉美英，〈從「山本氏紀念碑」探究在臺日人的移民生涯事蹟 以山本義信為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論文，2009年。蔣竹山，《島嶼浮世繪 日治台灣的大眾生活》，臺北市，蔚藍文化出版，2014年4月。

蔡家丘，《草枕：日治前期日本來台書畫家的創作與遊歷（1908-1927）》，國立臺灣大學藝術研究史博士論文，2007年。

謝世英，〈由魏清德《臺灣日日新報》〈忙中賞心錄〉談中日臺書畫交流〉，《國立歷史博物館學報》，2009年5月，頁41-54。

蕭惠文，〈論初山衣洲及其「南菜園時期」的意義〉，《台灣文學評論》，2010年10月，頁67-84。